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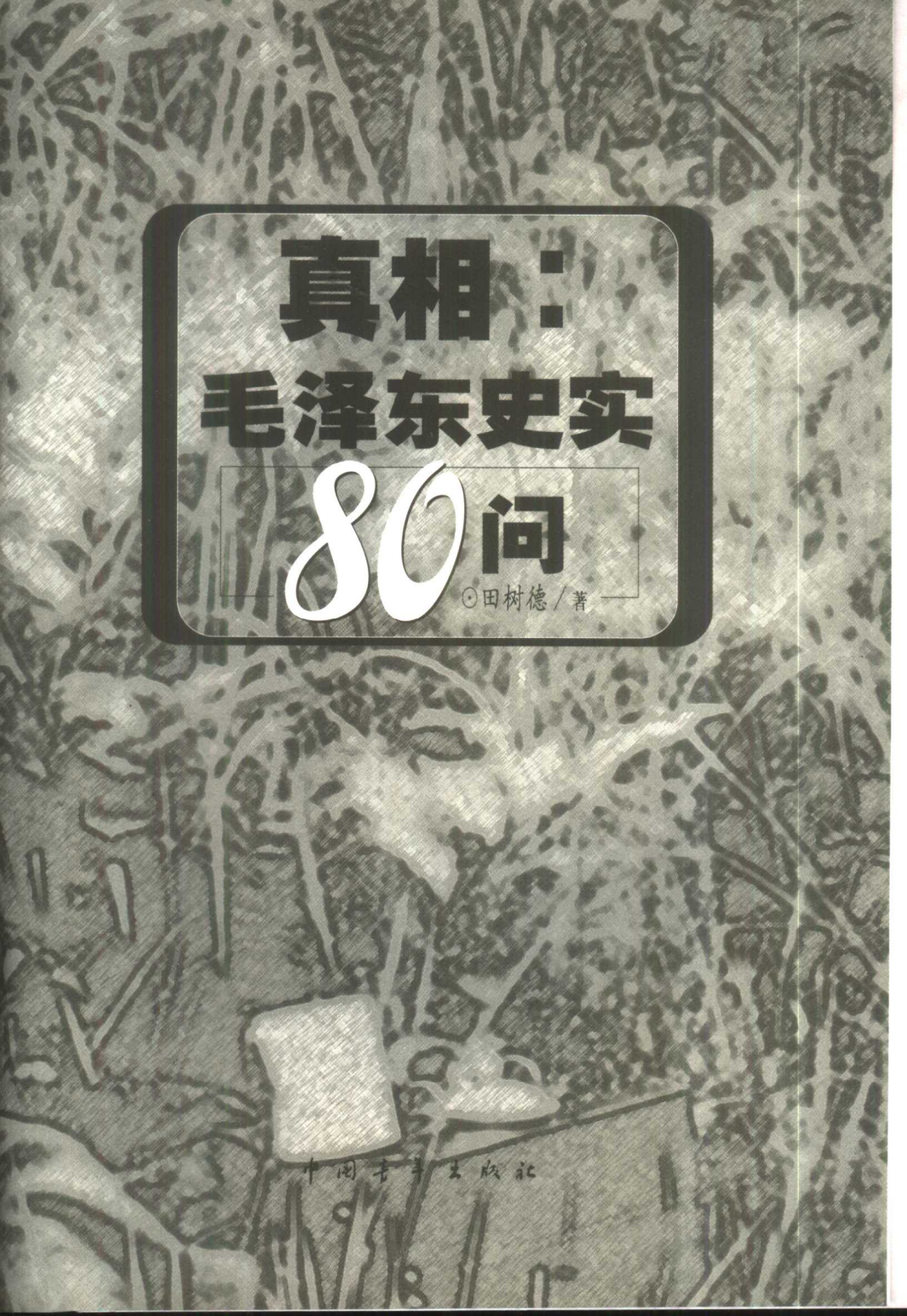
史实 毛泽东 真相 80 问

◎ 田树德 / 著



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贺子珍出走是江青“搞臭”造成的吗？
 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吗？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说了什么话？
 毛泽东是否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吗？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谁伪造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写了几张大字报？

中国青年出版社



真相： 毛泽东史实 80问

◎田树德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相: 毛泽东史实 80 问/田树德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ISBN 7-5006-4571-6

I. 真… II. 田… III. 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研究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663 号

责任编辑: 吴方泽

装帧设计: 许欣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农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3 插页 230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自 序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专家。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最初也没有写这部书的打算。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与本人从事编辑工作有关。因此可以说，如果本人不从事编辑工作，便不会撰写这部书。为什么这样讲呢？话必须从 1982 年说起。

1982 年，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后，经常要处理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稿。在编发这些书稿的过程中，发现对毛泽东及有关史料的记述有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

例如，对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有的著作说他婚后有 4 个儿子；有的则说有 8 个儿子。这个问题，关系到毛泽东的世系族支问题，说法不一怎么行呢？

对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的著作说是“贫农”；有的说是“中农”；有的则说是“富农”。这三种不同的记载，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对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有的著作说是 8 岁；有的说是 14 岁。对毛泽东原配夫人的姓氏，有姓杨、姓李、姓罗之说。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在编发的书稿中选用哪一种说法呢？

对毛泽东早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的著作说是 1918 年 8 月 19 日；有的则说是这一年的 9 月或 11 月。其时间相差几个月，怎么可能呢？

对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有 8 种说法，即 1928 年的 4 月 18 日、4 月 20 日、4 月 23 日、4 月 24 日、4 月下旬、4 月 28 日、4 月底、5 月 1 日。其地点，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十都；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沔渡；有的说是在江西宁冈县砵市的龙江书院。说法这样多，肯定有许多误传。

对苏区中央局于 1932 年 10 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有的著作说这次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因为周恩来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毛泽东受到党内处分；而有的著作则否定这种观点，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类似这样说法不一的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探究，在所编发的书稿中力求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愧读者。

另外考虑到，编辑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他及其思想进行正确阐述和评价，显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国际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

此，编辑出版毛泽东图书，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如果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缺乏研究，怎能纠正书稿中的差错？

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弄个清楚，编辑出准确无误的精品作，针对上述情况，我在编发书稿的过程中以及工作之余，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广泛收集史料，认真阅读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致力研究与毛泽东有关的诸多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曾经并且将继续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功绩不朽，他的事业长青，他的光辉思想永恒。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至今对他无比敬仰，并且深切怀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必然会进行历史的联想。回顾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几经挫折，几易首领，最后选定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以来众多的人致力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在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

论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 20 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

毛泽东还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②

1943 年 7 月 5 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 22 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尽管已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应属于王稼祥。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

① 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2 页。

② 引自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版，第 456 页。

毛泽东著作，并发表了一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明显的不足之处，则是其论述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已知的资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毛泽东著作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情况比较好，而其缺点是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多限于引证、注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口号；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因此，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比较好，但存在过于强调宣传毛泽东个人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现象。特别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学习、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向了邪路。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在这 10 年中，全国出版和编印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及专题语录摘编，其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但真正正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甚少，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遭到了厄运。

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紧密围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以及如何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和排除右的干扰，揭开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1978 年 12 月 18 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 1981 年 6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作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概括，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正确依据和条件。从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专门机构和研究队伍大量增加，论著日益增多。

据统计，从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到 1978 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30 年里，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 1.2

万篇，编印毛泽东的图书 640 多种。近 10 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 800 多篇，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传记和回忆录等 500 多种。1987 年，湖南图书馆和韶山纪念馆在长沙举办毛泽东著作版本展览，展出 52 种文字、2939 种版本。由此可见，其品种和数量之多！

时至 1989 年，全国悄然兴起“毛泽东热”。“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毛泽东走下“神坛”，身上的“神化”光环被摘去，人们便对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新的探寻心理。

除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闭状态，这本来是十分可喜的历史进步。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便会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对毛泽东更加敬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心理，必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凝聚成一股浪潮。于是，便导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毛泽东热”。

兴起“毛泽东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积极撰写有关的著作；全国出版界竞相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 R.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延赤执笔、李银桥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4月，权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和高湘泽等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出版。5月，汪东林的著作《梁漱溟与毛泽东》，董志英编写的《毛泽东轶事》，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等著作出版。6月，郑宜等编写的《毛泽东生活实录》、贾思楠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出版。10月，武原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权延赤编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年~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出版。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领袖·元帅·战友》。12月，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英编著的《毛泽东的儿女们》、逢先知等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国各报刊相继发表 200 多篇有关论述毛泽东的文章。上述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毛泽东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再现了他的不朽功绩，激发了人们对他更加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这样，“毛泽东热”日益高涨起来。

第二年，即 1990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 40 多种，有关文章 800 多篇。1991 年，全国出版毛泽东的图书 60 多种，有关文章 700 多篇。1992 年，初版、重版的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就有 140 种。

毛泽东图书出版热持续到1993年，形成规模巨大的高潮。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精心策划向读者推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其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仅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专门报批的就有270种，其中有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目录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丛书等，均为内容丰富的精品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故乡人对毛泽东怀有深情。因此，湖南各出版社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更加积极，计有50多种。其选题涉及哲学、史学、文化学、军事学及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10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既有在早些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第一批有影响的读物，也有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宝贵史料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的青年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等；既有以纪实的笔调描述感人的《毛泽东求学记》、《毛泽东外巡记》、《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也有客观地表现伟大领袖风采的《湖南文化与毛泽东》、《民族精神与毛泽东》等；既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成果《论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第一生产力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等，也有别具一格便于收藏的《毛泽东墨迹大字典》、《毛泽东邮票大典》、

《毛泽东诗词字典》等。湖南出版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图书，不仅品种多题材广，而且特色鲜明，为全国出版界所瞩目。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家人也加入编写关于毛泽东图书的行列。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主编了《人民领袖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主编了大型研究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编好这套丛书，毛岸青、邵华曾到祖国大江南北 10 余个省、市收集大量珍贵资料并认真进行考证。因此，这套丛书首次披露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从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情况来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 20 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报道，而对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却有记述。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才于 1935 年 12 月 12 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8 页。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和评价毛泽东的文字材料。其中评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①。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后，曾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版，第148页。

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通过 5 个多月的采访，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 1938 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 年 6 月至 7 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 6 月在美国《美亚》杂志 6 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

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

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